

陳果夫先生與中央政治學校

仲肇湘

陳果夫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的一位標準黨人，一生革命以外無事業，事業以外無生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可以當之而無愧。如果把中國國民黨分成三個時期，北伐以前第一期，北伐成功到抗戰勝利為第二期，行憲後動員戡亂，政府播遷來臺為第三期，則陳先生無疑是第二期中的中心人物，在他手上創建的事業甚多，而他付出的心血最大，對黨國留下的影響最為深長的，是中央政治學校。中央政治學校是中國國民黨培養政治幹部的學校，與黃埔軍校一文一武，隸鄂聯輝，並稱二難。它的一部歷史，民國十五年在廣州創辦的黨政訓練所是個楔子，十六年至十八年在南京開辦的中央黨務學校為其序曲，十八年至三十六年的中央政治學校為其正傳，三十六年以後改為國立政治大學，以迄在臺復校，則是它的續集。續集與正傳，雖然一脈相承，但黨辦與國立，本質上究有不同。這部歷史，從楔子到序曲到正傳，事實上都是陳先生寫下來的，但為人所難於索解的，乃是陳先生在政校前後擔任的職務，為民國十五年的黨政訓練所所長，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的中央黨務學校總務主任，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

，其餘為校務委員，不過如斯而已，名實大不相稱。而且陳先生同時擔任着其他黨政重要工作，校事等於兼攝，然而在中央政校歷史中的陳先生，和陳先生歷史中的中央政校，却是形影相隨的雙方都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因為陳先生畢生獻身革命，祇要他認為是件有利於黨國的革命事業，就悉力以赴，不問名位，不避勞怨。憑他那股鏗而不捨的精神，事業一到他手上，往往自然會向四面開拓，而事業的重心，亦就自然的落在他身上。陳先生對於青年們尤其具有無限的熱忱，教不厭、誨不倦，獎掖愛護，無微不至。就在這心血的灌溉和感情的交流中，構成陳先生與中央政校不可分的關係。但就陳先生自己看來，政校是黨的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是黨的幹部，他為黨工作，正是份所應為，因此不僅樂此不疲，而且亦不知嫌忌。記得民國三十年九月他交卸了代理教育長以後，政校師生都稱他為老教育長，遇事不僅常常請教他，而且以他的一言為定，他也來者不拒，知無不言。最有趣的是繼任教育長張道藩先生跟着人家叫老教育長，前後任到了這種人我兩忘的天真境界，豈是稍有私意存乎其間者所能免強得來。

黨政訓練所是陳先生民國十五年在廣州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時所創辦，學員共百餘人，其時因容共關係，份子甚為複雜，但仍有一部份為國民黨的忠實信徒，是為國民黨訓練黨政幹部之始，十六年北伐軍到了南京，深感黨務人才的需要，由陳先生商請戴季陶、丁維汾、葉楚傖諸先生，創辦中央黨務學校，經中常會通過任命今總裁蔣先生為校長，戴季陶、丁維汾、陳果夫諸先生為籌備委員，後來任戴季陶先生為教務主任，丁維汾先生為訓育主任，陳果夫先生為總務主任，適其時政局發生變化，蔣先生下野，孫傳芳軍隊進襲南京，首都岌岌可危，學校處孤城之中，賴陳先生在上海籌款維持，弦歌得以弗輟。這是陳先生將學校毅然引以為己任之始。黨校辦了一期，國民黨中央有見於訓政開始，需要政治幹部，乃決定將黨校改制為中央政治學校，即以黨校第二期新生為政校第一期生，校長之下，設教育長以總其成，由丁維汾先生擔任，下設教導、總務兩處，由余井塘及吳挹峇兩先生分別擔任，陳先生為校務委員之一。校務委員都有黨政要職，祇有陳先生因個性關係，對學校及學生關切最多，因此學校的責任逐漸加重在他身上，自

民國十八年至廿七年這十年中，他雖僅校務委員之一，而事實上則為學校重心所寄，在這一時期中的校務興革，多半出於他的規劃。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學校西遷，丁維汾先生辭教育長，中央任命陳立夫先生代理了一個短時期，廿七年二月改任陳先生為代理教育長，一直到三十年交卸，這三年半中，陳先生以政校的職務為本職，所化的心力也最多，而學校許多興革，亦都奠立在此一時期。自三十年至三十六年這一段時期中，陳先生因仍係學校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另兩位是丁維汾先生及戴季陶先生，不大開事）故對於學校和以往一樣的關切過問。及至三十六年改為國立，校務委員會的制度取消，他才覺得有避嫌的必要。不幸學校改制後即發生風潮，陳先生其時臥病在上海，他若事先得知，憑他和學校的關係及和師生們的感情，一定可以消弭於無形，後來他一直都認為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陳先生對於教育有他的理論和主張，見於他所著的「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一書。在教育的原则上，他編重於實用主義。政校科、系、班、院之設置及課程內容，都基於這一觀點。政校除大學部外，前後所設的學院、科、班之類，列學出來，真是洋洋乎大觀。有高於大學程度的地政學院、計政學院，有相當於大學部的各種專修科，計有地政專修科、統計專修科、邊疆語文專修科，最早還有測驗工作人員養成所，有辦一期的，有辦幾期的，期間長短不一；有屬於公務人員訓練性質的，計有高等科、普通科、法官訓練班，訓練各類考試及格人員，還有人事行政人員

訓練班，則為調訓性質，都是與考試院或司法行政部合辦的；有屬於教育邊疆子弟的，最早有蒙藏華僑特別班、蒙藏班、西藏學生特別訓練班，以後綜合為蒙藏學校，後又改為邊疆學校，並在包頭、肅州、西寧、康定、大理等處，設立分校；而在大學部裏，除了政治、經濟、教育、法律、財政等系而外，尚有外交、地政、新聞等系，都是當時其他大學所無或少有的學系。以上這篇流水帳，也許還有遺漏的。像這樣的頭緒紛繁，參差不齊，也有人以為然的，但陳先生有其一貫的實用原則，無一不是為了實行主義，適應政治需要而設。他並不忽視正規的大學教育，但認為大學部以外的學院、科、班，因事制宜，因人設教，有同樣的重要。他對於課程方面的見解，也以實用為原則，所以政校訓練出來的學生，以實際工作能力見長，就是陳先生注重實用主義的結果。

陳先生對於教育方法，有他獨特見解和別出心裁之處。最主要的是軍訓制度及訓導制度，此外還有他得意的創作：始業教育和結業教育。現在先把始業和結業教育說明一下。陳先生非常欣賞我們老式的啟蒙讀本「三字經」，認為一個人立身大道及基本智識，提綱挈領，盡在其中，初學童蒙，讀了它，可以得到一生為人為學的門徑。他由於「三字經」的啟示而創設了始業教育。在新生入學之初，規定相當時日，自一個月至六個月不等，教以教育宗旨、總理遺教、校訓、校規、校史、校長言行、以及讀書方法、人生觀、課程說明等等，同時並施以嚴格的軍事訓練，使

學生瞭然於入校求學的目的，以奠定其接受教育的基礎。所謂結業教育，就是在畢業考試完畢以後，規定三天到一星期的時間，請有社會經驗、行政經驗的老師或校外人士，指導學生應如何做人做事，如何進德修業，如何應世達變。這兩種教育方法，聽來似無足奇，但却是陳先生的創作，後來各校有仿行的，不過不像政校那樣認真。

我國大學之實施軍訓制度，以政校為始。軍訓包括軍事管理及軍事訓練，旨在養成學生嚴肅的生活習慣，紀律觀念，及文武合一的智能。軍訓在教育上的功用是顯而易見的，但當時教育界的情形，祇有政校可以作為首先實驗的園地。及至抗戰軍興，局勢激變，於是其他學校亦多採行。到了勝利復員，憲政開始，學校軍訓制度取消，及政府動員戡亂，播遷來臺，始又恢復學校軍訓制度，但比諸當年政校的軍訓，其嚴格、認真的程度差得很遠。現在大中學校的訓導制度，其始亦創於政校。不過政校當年的訓導制度，比諸現在各學校，亦要嚴格認真得多。政校訓導所管的方面甚廣，包括學生的進德修業及一切公私生活。每位訓導分配若干學生，通常為二、三十人，要主動的去和學生接觸，兼導師和家長於一身。我們往往以造林來比喻育才，像政校的訓導制度，豈祇是造林，簡直是墾園。政校學生，一般都有強烈革命意識及國家民族觀念，固非偶然。陳先生對於政校訓導制度的規劃推行，用力甚多，他常常以為「道學問」是教務方面的事，「尊德性」是訓導方面的事，後者的比重，至少不應比前者為輕，所以他對於現在各學校的訓導制度

，猶以為未足，不過，訓導制度能够為大家所採用，也慰情聊勝於無了。

陳先生最使師生們留下不磨印象的，是他領導學生和對待老師的風度和方法。陳先生生來就具有一個教育家的性格典型，公德私德，俯仰無愧，所以師生們對他都有個敬仰之心。陳先生對學校老師非常親切有禮，經常和他們接觸，遇到年節，還分別去拜年，對資深教授，尤頻致其拳拳之意，有十足的老派的人情味。對於學生們則完全以自己的子弟視之，嚴父慈母兼而有之。管教是非常嚴的，但秋風起了，便會想到學生的被服準備好沒有，吃到飯裏的稗子太多了（抗戰時期的公糧都是糙米）便會想到學生們是否會得盲腸炎，凡是學生們有求於他的，祇要是正當而力所能及的，無不為之設法。記得政校在重慶小溫泉的時候，常有不遠千里而來的邊疆學生，年紀小的才十五六歲，他為之安排食，安排宿，那裏是教育長，簡直變成了保姆。學生們有時鬧事，汹汹而來，一見他那蒼白而略帶憔悴的面孔，嚴肅的神氣，炯炯的目光，先就洩了氣，最後總在他精神感召下和平的解決了問題。民國二十七年政校在撤退途中，在湖南的芷江，鬧了一場風潮，有一次他和學生們在廣場上一言不發的相持了半個鐘點，結果，還是他那股「甘地精神」，得到了勝利，所以陳先生和政校學生的關係，不在師生的名份，而在感情的交流。

陳先生與政校畢業生間的關係，亦不同於尋常。政校黨辦的學校，陳先生主持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對於黨辦學校訓練出來的幹部，繼續予以指導調度，在他黨的崗位上來講是天經地義之事。

。政校校本部設有畢業生指導部，在學校系統以外，另有政校畢業生同學會，它與學校關係的密切，亦不同於一般學校的畢業生同學會，這兩個組織是一雙孿生子，辦理關於畢業生同學調度工作，創辦事實，進修學業，淬礪品德及其他有關同學團體的事。政校學生學的是政治，工作調度當然不出乎黨政的範圍，同時因為有畢業生指導部及同學會的關係，呼應聯絡較為靈便，於是漸漸引起外間的誤會，亦陳先生所受一部份毀謗嫉忌的由來，其實在陳先生心目中，祇見其為黨的幹部，不見其為政校同學，更不見其為個人的門生，以陳先生的樂於獎掖後進，在他領導畢業同學的過程中，我不敢說沒有君子可欺以其方之事，然而在他的主觀上，確乎是廓然大公，經過他這樣培植獎掖出來的人才，其斐然成章，蔚為國家社會之用者實不少，同時政校畢業同學在各方面的服務成績，平均都够水準，也應當是個公論。這都不能不說與畢業生指導制度有相當關係。以上是在陳先生主持下，政校在教育設施上不

同於其他大學之處。

寫在魯傳鼎「三十年前中大學生」一文之後

湯靖孫於美東匹磁堡城

正是同班舊友的嫂夫人，可知文中所提所寫，那樣惹人懷舊，如果說牛肉麵「稀世美味」，那更是千真萬確，在異鄉居久的「同胞」聽來無不有垂涎萬丈之慨。就說「八碗稀飯，半塊腐乳」，也堪稱滋味無窮。有人稱，物以稀為貴，我則以為大凡吃過貧金飯的人，特別「憶舊」情深，更覺得此物不愧為盛餐之餘，唯一「佐味佳品，愛信筆寫此，以供中外舊交，再作一溫古憶往之意。

寫在魯傳鼎「三十年前中大學生」一文之後

湯靖孫於美東匹磁堡城

我是中外雜誌新讀者，最近剛剛接到五卷五期，看了中大沙坪壩一文，頓覺難以釋卷，本來不會寫文章，豈敢顯拙，祇是讀之再三，不寫下幾聲「心中共鳴」似乎有言不盡的感慨！我雖與作者不曾相識，但文中所言，嘉陵江畔，松林坡上，句句熟悉，那末知與不知都無關係了。談起 委員長蔣公兼長中大的日子，正是我同作者一般在壩上「三搶」的日子，再說聞名中古的「中大皇后」羅斯福，却